

几年前，我的一位合唱班“女歌友”去婚介所登记求偶，资料一经进入系统，“适配男方”便频频进入她的视野。那些单身男人中，不乏让她动心的，但每每考虑是否要继续发展，她总是犹豫。因为并非知根知底，想以感情定局，几近苛求，并且，彼此很难建立起信任感。于是，相亲的原则，就只剩一条：条件。条件的匹配度，决定了相亲是否会成功。

可她还是与其中一位“在刑警大队工作”的“适配”对象交往了一段时间，甚至，还安排她这样“擅察人心”的“小说家”和他俩一起吃了一顿饭。作为关系甚密的歌友，她说她相信我的判断。事实上，我的表现肯定令她很失望，我被男人那张像农民般忠厚朴实的面容、以及诚恳得近乎过分的举手投足所蒙蔽。

关键时刻，女人生出自我保护的警觉，她托人调查，发现那个所谓的“刑警”，只是警队大院内的的一名保安。我没有问过女歌友是怎么发现他在骗她的，事实上，她自己都无法分辨，是不是一开始就错误理解了“在刑警大队工作”这句话。

也许，最初的谎言只是自我安慰，可以说，一个谎言，就是一次意淫。高速发展的通讯科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是让谎言成为人们判断与评价事物的信息。信息让我们得益与获利，信息让我们受骗和上当。于是，有人成为骗子，有人成为受骗者。

好吧，让我们跳开物质，进入情感世界，抑或，说说爱情。

冒险之旅

薛舒

乞丐对美女说“我爱你”，他该怎么证明他没有骗她？他把讨来的三餐冷饭都给美女吃，自己饿肚子，这是他的全部身家，他爱她，可谓满分。

富翁对美女说“我爱你”，然后动用十个手指头中最小的那个，豪车、别墅、小部分财产，将美女捕获。美女享用之余，偶尔会想，他爱自己到底有几分？

没有哪个美女愿意把一生许诺给她全心全意的乞丐。富翁并未把全部身家给美女，但他绝不会被当成骗子。好了，说来说去，情感的度量衡依然是物质，那么是否就可以这样说，拥有物质越少的人，越难以得到属于他的

不改初心

李珏

在露天咖啡馆与朋友喝咖啡，不时有人伸手要钱。朋友说，现在的“赞助”竟然也有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的。两人摇头叹气。

小时候，家里并不宽裕，但奶奶每每见到穷苦人，总要掏一角两角的，且郑重地告诫我们：讨要钱粮，那也是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了。所以，只要人家伸手，咱们必须给予。但现今，就是有人利用人的善心，把“伸手”作为一种职业、一种少花力气快速致富的途径，甚至乔装改扮、捏造谎言，博取同情。如此鱼目混珠，待到真有需要帮助的人出现，吾等也是无从分辨了。朋友说很多人不仅拒绝施舍，连带着由此对公益也产生了怀疑，总觉得捐的钱会用途不正。我觉得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该混为一谈的。

话说当年为地震灾区的一个女孩子助学，倒是一门心思、没啥杂念，就想着能让她顺利完成学业。转眼四年，女孩来信说想“专升本”，问我是否可以继续助学。恰巧当时我正在医院接受乳腺癌手术，便告知了实情，自此女孩便如黄鹤音讯杳然，再无下文。原本并无“投桃报李”的愿望，只为助学是自己的心愿而已，但女孩子如此冷淡的作派，终究叫我唏嘘。

经常会想起那个女孩子，但遗憾的是终究再也无法联系上了。或许我这人跟公益有缘，病后两年，居然加入了“粉玫瑰关爱女性健康行动”的公益组织，“粉玫瑰”里，与其说我付出的多，不如说我从中汲取到的力量更多。怀疑有诈，与坚持信仰是两回事。事实上，周围的朋友们是始终不改做“公益”的初心的。

《外国名歌二百首》音乐会，日前已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圆满落幕。这场承载着几代人青春记忆的音乐会，人们趋之若鹜、一票难求。由此还带动上海书城里库存的、“文革”后再版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及续编，也销售一空。这场音乐会有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是始料未及的。

去年盛夏，我和上视纪实频道编导一同策划，想为翻译家、音乐家薛范先生拍摄一部电视纪录片。在采访过程中，我与薛范相约，并承诺在年底举办一场《外国名歌二百首》的专题音乐会。并请他担任演出的艺术顾问。此举既可完成我多年想把这些作品搬上申城舞台的夙愿，届时还可补拍几组镜头，以充实电视画面。

薛范与《外

爱情？尽管一个物质贫乏的人可能拥有丰富的情感。

于是，就有了“条件”，那是度量衡上的砝码，它成为爱情抑或婚姻的重要参考，甚而决定性因素。所谓条件，就是一些信息的汇总，很多时候，真实的信息经过意淫，最终成为谎言，或者，“被谎言”。

某日听一位台湾作家转述一则曾在台湾备受关注的新闻事件，高学历高薪女工程师被网络上号称美国中情局局长的骗子骗了，骗金钱，还骗爱情。女工程师却执迷不悔，她坚信此人存在，还秀出云端情人寄给她的婚戒，并向媒体宣称“我的爱情是真的。”

我们在接到陌生电话时心里立即架起设防，我们在相亲时不断试探对方“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选我？”，我们的手机相机拥有自动修颜功能，我们为自己做种种有关美貌、幸运、财富的角色设计，并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我们一次次的意淫，造就了一个个谎言的诞生，然后，习以为常，并继续生活。

自打发生“相亲事故”后，我和“女歌友”，我们渐渐疏远了关系。不是她要躲避我，也不是我要逃离她，而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脱离对方的生活圈子。因为，真相被两个人所知，便不再安全。很多时候，我们把精神安全看得比人身安全更重，尤其是，当我们发现，我们被自己愚弄时。那种时候，我们不需要他人的安慰，我们要的是以孤独遮羞。

也许，我们应该苛责的，根本就是自己的功利心。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人，一开始就选择了冒险。或者说，每一次相亲，都是一趟冒险之旅。

致母校

闵文斌

我是多么爱你，你却难以寻觅。找遍尘封的记忆，没有你的踪迹。

我已不能走近你，你却走进我梦里。懵懂、青涩的故事依稀，我竟未曾失去你。

在“名歌”的天空下

李定国

国名歌二百首》及续编，可谓渊源深厚。甚至可以说，是这两本歌曲集，成就了他以后人生的辉煌。演出当天下午，薛范及其家人早早来到现场，给我们演员的合乐、走台把关。此次音乐会，原本有我的两位挚友：北京的程志和四川的张莉参演。由于演出日期的变更重叠，使他们无法成行。于是，我临阵又请来上海民族乐团的女高音歌唱家王静和上海军东海舰队的男高音歌唱家王群尧加盟。不料，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给观众带来惊鸿一瞥。

贵州姑娘王静，从小就受到当地多民族音乐的熏陶，是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的歌者。她演唱的《阿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如果身上有刺，拥抱就会遭伤害。

我们现在还在用过时的概念吗？答案是“**Yes**”，但是很少。举个例子，“日落”就是一个历史留下的以“地心说”为基础的残余概念；而地心说则是在哥白尼的“日心说”创立以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理论。

所谓的日落，天文学家将它理解成太阳在地平线以下从人的视线中消失。说具体一点，即日轮的下边缘和地平线开始接触到上边缘和地平线接触的这一过程。这一过程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在什么季节、在地球的什么部分以及观察者位于什么地方。比如日落在赤道上的持续时间很短，因为那里太阳几乎是垂直落下的；三月和九月的昼夜平时分（即春分和秋分时），赤道附近的日落持续时间正好是6秒钟。在其他月份里，日落的最长持续时间可达2分钟。

离赤道越远，至日轮上边缘在地平线以下消失所需的时间越长。根据不同的季节，比如在荷兰、德国、波兰、白俄罗斯等国的日落可持续3至4分钟，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苏格兰地区的日落过程持续时间更长。在北极或南极，太阳总是24小时以同样的高度移动着。冬天有半年时间在地平线以下“兜圈子”，这时有半年时间是“黑夜”；夏季正好相反，太阳始终在地平线的上方，晚上也不“落山”，这便是6个月的“极昼”（极昼发生在极圈内，24小时可直接见到阳光。而“白夜”是在极圈外的高纬度就能经历到的、整夜天不完全黑的晨昏蒙影现象）。

日落前后，天空或云层上会出现艳丽耀眼的彩光，系由接近地平线的阳光经大气中灰尘、水汽和气体分子散射后的剩余余光组合而成，这一美丽的色与光的现象，中国人称之为晚霞（发生在日出前后的叫朝霞），晚霞比朝霞浓重多彩。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霞也指白天开始前或白天结束后，昼夜之间的“流畅”过渡。霞，尤其是晚霞，不一定像通常所说的是红霞，严格讲应该是彩霞，包括红色、橙色、黄色、紫色、绿色等。人们曾用特技摄影，拍摄到各种令人震惊的彩霞；在能见度特别好的条件下，甚至还能看到其中的绿色闪电。

中国古代文人很早就诗词中描绘和颂扬晚霞及朝霞了，如宋·朱熹在《晚霞》中曰：“日落西南第几峰，断霞千里抹残红。”劳动人民还能从浓抹的晚霞判断出次日为大好晴天：“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彩云结得高，明朝晒断腰。”因彩霞之艳丽，古代一种妇女的披肩服饰于是被称为霞帔，宋以后，霞披甚至被定为妇女命服，按品级高下而规定华丽贵重的程度。晚霞，宛如陪伴和护送日落的丽人。

江南造船厂的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津贴。他还是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设计者之一。杨工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期间，就喜欢上了歌唱。这样的爱好，伴随了他一生。歌唱使他的心态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工作更有干劲。顾民权、竺可成、王开荣和徐晓等歌唱家，轮番在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音乐会上登场。压轴大戏当属风采依旧的声乐艺术家戚长伟。一个在音乐舞台耕耘了一个多甲子的86岁老人，他的演唱从容不迫、举重若轻，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戚老师的歌声，浸润着岁月的沧桑和勃勃的生命律动。难以想象耄耋老人的歌声，比年轻歌唱家更动人、更漂亮。

我父母养育了四个子女，我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哥排行老大，家中不少我们不会做的家务都是他的强项，哥会裁剪、缝纫、理发、修鞋、砌墙、做“行灶”……替父母分担了很多家务，他那双粗糙而又灵巧的双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家里门两旁的墙壁原先是木板置成的，时间久了木板腐烂了，雨天刮进了水，哥想拆了砌砖墙，经邻居天为介绍，星期天，父亲与哥借了辆劳动车（平板车），两人到昌化路一家厂里拉回了足足一车煤屑砖，累得满头大汗。哥从来没有做过泥水匠的活，他都是看邻居砌墙而默默记在了心里。他模仿着人家用一根细绳吊着半块砖头做垂直水平线。煤屑砖易碎，他稍稍将其浇湿，便左手持砖，右手拿砌刀，砍砖，抹石灰，垒砌时跟线，砖与砖左右相邻对平，竖缝横缝的石灰浆填充密实，两堵墙砌好了，他又在墙面抹上了厚石灰，从没砌过墙的他，居然把两堵墙垒砌得平平整整又结结实实。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弄堂里兴起了一股自学裁剪热。哥也成了一个裁剪迷。他托人买了紧俏的《服装裁剪基础知识》，就依着葫芦画瓢，他的自学能力和动手能力特别强，买来划粉、软尺、裁剪刀，在一大叠报纸上苦练裁剪基本功，他把自己的旧衣旧裤拆了再缝起来。没多久，他居然会弄弄堂里的人裁剪裤子和衬衫了，只要有人找他，他都有求必应。帮人量尺寸，他像模像样地从脖子上取下软尺，这里量腰身，那里量胸围，又拿起铅笔记下尺寸，俨然一个老裁缝。他帮左邻右舍裁裤子做衬衫不收分文的，一时间，哥成了弄堂里炙手可热的“裁缝”了，我家对门的苏北老裁缝对他直翻“白眼”。

哥中学分配去崇明农场后，没有放弃他的业余爱好。1974年，他在连队帮我做了条“的确良”裤子，我竟然独自乘双体客轮专程去崇明取回了我人生第一条“的确良”裤子，那时的“的确良”料子也算是时髦货了。哥由农场上调回沪后我又去了星火农场。1978年10月，奉贤南桥举办庙会，我买到了久盼的军绿布，利用场休，我迫不及待地吧布料送回了家，哥拿出一块画粉，在军绿布上横横竖竖画起了线条，不一会儿，一张清晰的裤子图样展现在我的眼前，接着，他拿起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了起来，剪刀就像火车在铁轨上跑一样，顺着布料上的划线向前移……仅大半天的功夫，他帮我与朱良沪各做了一条军裤。八十年代后期，街道党委书记黄英兰的丈夫赵云俊担任了上海市外办主任，一次，老赵隔日要出国，临时想起要做条裤子，情急之中，我把老黄给我的裤料和老赵的一条样裤带回了家，哥凭凭老赵的样裤，连夜帮他赶制了一条西裤。老赵穿着哥做的裤子陪同市长出国了。

家里的套鞋（雨鞋）坏了，哥买来胶水，坐在小凳子上，双膝盖上一块旧帆布，他把套鞋夹在双腿之间，先用小锉刀把破裂的表面锉出毛头，在套鞋破损的地方和内胎皮上分别涂上胶水，稍干后粘贴上，用小锉刀的背面木块将补的地方敲紧，他俨然又像个“老皮匠”。

母亲手纳的鞋底与做好的鞋帮，也是靠哥用粗针、锥子和鞋线一针一针镶上去的。多年来，我与弟一直穿着母亲与哥合制的“松紧鞋”。哥又怕我与弟的鞋底磨损得太快，他又剪开了自行车的外胎皮，为我的“松紧鞋”钉鞋掌，他翻出专用工具，一个铁制的鞋撑，将“松紧鞋”套在鞋撑上，用鞋钉沿车胎皮四周钉上一排鞋钉，中间也钉上几个，钉好后的车胎皮四周大出鞋底，他也没有皮匠用的那种削刀，使用剪刀或刀片修剪，让鞋掌与鞋底平整如一。“松紧鞋”绽线脱线脚了，哥会用鞋底线一段段重新缝上。

1973年，家里的地坪坏了，哥正好从农场回来，父亲带着哥与我，拖着劳动车去天原化工厂拉回一车车的“电石污”，作为铺地坪的材料。只见哥先把泥地铲平，又用泥刀把地坪斩成毛糙地，扫尽浮土，洒上水，将一桶桶的电石污倒在平整的地坪上，哥拿着木抹子，蹲在地上一抹又一抹，抹平地坪上的“电石污”，累了，他伸个懒腰，一点点抹，一点点退，直抹到家门口，人也退到了门外，正好抹平收头。干燥后的“电石污”地面，坚如磐石。为了装卸“电石污”，我赤脚猛干，脚泡在“电石污”中不幸划伤感染，红肿、发炎、化脓，至今，我的脚上还留有二块疤痕，那年，我才十五岁。

除此外，哥还会做煤球炉、养鸡，爬上屋顶铺瓦片筑漏和修“老虎窗”。他的手艺还会很多很多。

老人的手艺

陈建兴